

文学作品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

王 文 生

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原則認為文学是以形象的方式在生活的发展中反映生活的。这样一个完整的概念使得馬克思主义文学观与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文学观区别开来。它既反对那种把文学当作心灵的产物、絕對理念的外化的唯心主义；也反对那种虽承認文学是生活的反映却又認為生活是絕然不变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

因此，在馬克思主义者看来，除了坚持生活是文学的現實基础这一唯物主义观点外，还必须用辯証方法来分析生活，強調指出生活是永远发展着的，生活的存在和发展就是矛盾的相互依賴和相互斗争。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問題。唯心主义者沒有認識這個問題，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者也沒有認識這個問題。唯其如此，过去有些唯物主义者~~在~~解釋文学現象时虽接近了文学是生活的反映这个真理，却从沒有正确解决文学如何反映生活、如何推动生活前进这样重要的問題。只有馬克思主义者才对此作了正确的回答。一九三四年通过的苏联作家协会章程就明确規定了，社会主义現實主义文学要求“艺术家从现实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现实”。这里所指的从现实革命发展中描写现实，也就是要求文学反映生活的矛盾和斗争。这个道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講話中也說过：“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創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幫助羣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例如一方面是人們受餓、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剝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們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現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羣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羣众走向团結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毛澤东論文艺” 65——66頁。）由此可見，馬克思主义者是十分重視文学反映生活的矛盾和斗争的。因为，离开矛盾斗争，就沒有生活，也沒有文学。

与这种情况相反，我們看到有些人用形而上学的观点在解釋生活。他們以无冲突論妨碍文学对現實作真实的反映。这种观点在我国和苏联都曾出現过，虽曾几經批判，但从最近某些創作和批評文章来看，它仍然以各种形式出現。就以文艺報第七期武养评价“鍛炼鍛炼”的文章为例，他認為赵树理同志在这篇小說里描写了“不是佔农村大多数的”象“小腿痛”“吃不飽”这样落后的妇女形象，描写了不是“党的化身”的干部（虽然，作者也認為赵树理同志爱憎分明，对落后妇女和“八面园”的主任都进行了批判，使人很感痛快。）描写这些对我们社会來說“不是典型的东西”，就是歪曲了现实。类似的观点也表現在蔡葵“关于‘在和平的日子里’的一些問題”这篇文章里。（文艺報一九五九年十二期）蔡葵認為，我們的生活是不沉的水，温暖的湖，只有那些本来就是极端个人主义者，而又死抱着个人主义不愿改变的人，才会沉到很深的底里去。而杜鵬程同志描写一个久經鍛炼的干部消极退坡的現象，其真實性是值得怀疑的。

武养、蔡葵的观点是与形而上学无冲突論相联系的。他們或者要求作者孤立地描写生活的主流而排斥生活的支流，或者直接否認人物性格发展和变化的可能性。他們沒有認識到，生活本身就是矛盾相互依賴、相互斗争、相互轉化的过程。誠然，在我們这个社会里，进步积极的一面是生活的主流，落后保守的一面只是支流，但进步与落后却是相互对立而存在的。沒有落后，也就无所谓进步，沒有进步对落后的斗争，也就沒有生活的发展。同时，进步与落后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一定条件下，矛盾的一方可能向另一方轉化，进步可以变成落后，落后也可以变为进步。因此，我們的文学作品要反映生活的真实，就不能孤立地描写生活或靜止地描写生活。既需要描写积极进步的人物而加以歌頌，也要描写落后保守的人物而加以揭露；而且还要描写它們之間的斗争、变化以及进步力量不断胜利的过程。反之，象武养、蔡葵的要求那样，文学作品就只能違背生活的真实（因为生活里是有困难、有变化的。）而起粉飾生活的作用，文学也就失去其积极改造社会生活的作用而成为僵死的东西了。

武养、蔡葵这类形而上学无冲突論的观点在創作中是有着回响的。这表现在有些作品不敢描写生活的落后現象，避开生活的真正矛盾，用誤会或欺騙的办法代替生活的冲突。这些作品描写英雄人物不是描写他們如何同困难和落后进行斗争的过程，而是讓他們参加一場人为的鬧剧。比如先进人物得了奖励却告訴自己的爱人說是受了批評，引起爭吵，最后真相大白，皆大欢喜；又如庄稼本来长得很好，凭空来了一場大冰雹，讓先进人物与人工災害作斗争，最后獲得丰收；或者是工地上来了一个陌生的劳动者，既而被人发觉，正是新到的厂长或党委書記等等。諸如此类，都是与无冲突論相联系的。他們所采用的方法是用人造的矛盾代替生活的矛盾，用臆想的冲突代替真实的冲突。其实質都是为了避开生活里真正的矛盾冲突。用这种办法写出的作品可能博得一时的“戏剧性”效果，却違背了生活的真实，象一朵紙花有形而无神，不过是生活的贗品。除此以外，也有把生活中的矛盾归結为几个一成不变的公式和原則的，如老年一定比青年落后，先生一定比学生落后，工程师一定比技术員落后，厂长一定比党委書記落后等等；如在工人提出一件技术改革时，往往遭到工程师的反对，得到技术員的帮助，厂长对技术改革表示犹豫，党委書記大力支持，最后改革成功，教育了工程师和厂长等等。这样一种把复杂的生活簡單化的做法忽視了生活矛盾的普遍性和多样性，实質上是承認几种矛盾而否認其他矛盾，表现在作品中就成了公式化、概念化。使作品缺乏感人的力量也削弱了它的社会作用。凡此种种，都是无冲突論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表现，对文学的发展是有着巨大的危害性的。

由此看来，为了文学的健康发展，还必要反对形而上学的无冲突論，还必要闡明文学反映生活矛盾的重要性的探索和文学反映矛盾的規律。現在，当我国国内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基本結束（但不是完全消灭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大量普遍的矛盾的时候，討論文学作品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也就成为十分重要的課題了。

文学作品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是一个牽涉到多方面的問題，要想从理論上給它作几个理所当然的規定是困难的，还是先从具体出发，看看几篇作品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情况。

“一个半木匠”（作者：王联光。“文艺月报”一九五九年二月号）是被推荐为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优秀作品的。描写两个木匠制造收割器的不同态度。一个正式拜过师父的木匠费水富是农村的小有产者，是自私自利的人物。没有拜过师父的“半个木匠”费金林是雇农，是具有共产主义思想敢想敢干的人物。他们两人同去参观收割器时，费金林仔细认真，费水富漠不关心；订计划时，费金林敢想敢干，费水富思想保守；制收割器时，费金林带病工作，费水富消极装病。最后，在费金林的努力下，完成了任务，群众向他们祝贺，感动了自私自利的费水富。这篇小说对矛盾性质的认识是正确的，解决矛盾的方法也符合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但是，作品中的人物缺乏鲜明的个性，只是雇农和小有产者、敢想敢干和自私自利这两种社会力量的图影；先进人物与落后人物对事件表示了不同的态度，而没有展开性格的直接冲突；解决矛盾的方法虽然符合原则，但对长期为自己敲惯了算盘的费水富来说，转变得太突然，而不是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因而这个作品在思想上是正确的，作为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文学作品来说还不能算是优秀的。

“锻炼锻炼”（作者：赵树理。“人民文学”一九五八年九月号。）先进与落后的矛盾不仅存在杨小四、高秀兰与“小腿疼”“吃不饱”之间，也存在杨小四、高秀兰与保守的社主任王聚海之间。这两条线索的矛盾实际上是一种矛盾，即先进与落后及落后的支持者的矛盾。作者把斗争集中到一个方面，通过杨小四他们对“小腿疼”“吃不饱”的斗争，用事实教育了“八面园”的主任。这篇小说充满了农村生活气息，情节也是富有戏剧性的。作者还以特有的幽默讽刺了落后人物，用事实揭露了落后势力。小说对农村生活是有积极意义的。但由于正面人物没有很高的精神状态，没有能反映出进步的农民干部的面貌，这篇小说的教育意义是受到一定影响的。

“春桃”（作者：魏子良。“长江文艺”一九五九年三月号。）描写的保守与进步的斗争是围绕着养千斤猪而进行的。但正如作者所说，他“把打赌养猪提高到为了教育保守派起促进作用来描写”。就使得生活里一个平常事件富有了较大的思想意义。他让我们看到了，围绕着千斤猪而进行的斗争不只是关系到“臭虫”和春桃饲养者两个人，而关系到两种社会力量的冲突。在“臭虫”后面，我们看到与“臭虫”一鼻孔出气的人在力图破坏这件事，在春桃饲养者后面，领导与群众在支持这件事。这就使得养千斤猪的事不是寻常的打赌，而成为进步与保守力量斗争的焦点。而且，作者笔下的人物是性格鲜明而富有典型意义的。他没有把“臭虫”这个人物简单化，“臭虫”之所以破坏“春桃”的成长也不只是因为个人打赌的得失，而是由于他保守落后害怕大跃进的速度而引起对新事物的仇恨。这就突破矛盾的表面现象而看到了本质的东西。这个作品的正面人物也是写得有声有色的，“春桃”饲养者是一个敢想敢干，不怕困难，勇于斗争的人物。他之所以要养千斤猪，也不是因为个人的好胜，而是为了促进大跃进，为了用具体事例去教育保守思想。作者描写了他对“春桃”的细致爱护和克服困难的精神，表现他是十分关心新事物的成长、关心与落后力量作斗争的。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物的品质。这篇小说所描写的情节曲折而富于戏剧性，解决矛盾的方法也与上面两篇不同。矛盾的解决不是保守人物的觉悟和转变，而是“臭虫”企图毒杀“春桃”事件被揭发而受到监督劳动的处分。但是，通过这件事却教育了广大群众，暴露了保守力量的腐朽，歌颂了大跃进。这篇小说因为反映人民内部矛盾比较深刻，给人的教育意义也就比较丰富。

我还要带着特别的激情来谈谈“在和平的日子里”，（作者：杜鹏程。东风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本小说让我们看到精神境界更高的人物，看到一种更深刻的矛盾，也给予了我们更丰富的教育。作品描写的事件发生在铁道建设工地上。作品中相互对立的人物（如阎兴、小刘与梁建，韦珍与常飞。）几乎有着一段共同的生活经历，他们曾经是战友，是同学，是共同携手前进的同志。于今，却发生了可怕的分歧，成为斗争冲突的对立面。作者让我们看到，他们围绕着工地上发生的事情进行争辩、斗争、采取不同的行动，而真正吸引我们注意的，又不是这些具体事件，而是通过具体事件所表现的对待生活的两种不同态度。

作品一开头，就让我们注意到阎兴和梁建，这两个在战场上同生死、共命运的人，为人民流过血、立过功，经历过一段艰辛的生活道路，在战斗里凝成了血肉相连的友谊。现在，在战争结束之后，他们脱下军装，换上工作服，跨山越岭来到嘉陵江上，又在一起从事和平的建设。但是，我们看到的阎兴和梁建，过去的营长和教导员，现在的工程队长和副队长，在那个紧张的赶工期的时候，不是在讨论铁道工程上的事务，而是在讨论如何对待生活的大问题。这个问题贯彻着全书的始末，围绕着它进行着尖锐的斗争。作者不是无意地让我们看到，生活上两条道路的斗争不只是存在没有经历过风阶的常飞和韦珍之间，也存在经历过艰辛锻炼的战士身上。

在作者的笔下，和平日子生活是波涛汹涌的激流。这激流似的生活抛棄了充满资产阶级利己主义思想的常飞，也使得在生活中游泳游倦了的梁建面临重大的考验。作品向我们表明，生活需要一个人的紧张战斗精神和对人民的全部忠诚。如果你的信念动摇了，你的斗志松弛了，一个一个的困难就会袭击你，使你困倦，把你征服。即使你想逐波随流，前进的生活也会把你吞没的。这就是梁建所面对的巨大问题。另一种人，他们在生活的激流中乘风破浪，战胜生活的困难，获得百倍的勇气，他们把生活推向前进，生活也把他們提到更高的境界。他们是生活里的战斗者，也是生活的主人。这就是作者笔下的阎兴、小刘、韦珍和老工程师。这两种人同时生活着，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斗争不只是牵涉到一件工具的改革，不只是牵涉到一个工程的完成，而是牵涉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最宝贵的因素——人的成长。这样严肃的问题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无论是进步的、保守的、经过考验和没有经过考验的，凡是一切在生活着的人谁能不关心这样的大事呢？这就赋予了“在和平的日子里”以高度概括的意义。

这样高度概括的问题不是体现在抽象的讨论上，不是体现在细小问题上，而是通过关系着上万人命运的事件把它联系起来的。就使得这一斗争异常尖锐，异常深刻。作者描写梁建和常飞缺乏工作热情、不负责任，因为畏惧困难，没有进行加固便桥的工作。让洪水冲断了这工地的生命线，把工人隔在河那边的“绝境”，几乎毁灭了上万工人的命运，对个人主义作了深刻而有力的揭发。同时，通过小刘勇敢过江，克服种种困难，拯救被洪水隔绝了的人们，又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忠于祖国和人民毫无利己心的人又是多么崇高伟大。在这里，人民内部矛盾表现为激烈的冲突，激烈的冲突又揭示了矛盾的深刻意义。

杜鹏程同志在小说里描写了众多的正面人物形象。他用高度的热情，用诗一样的笔调表现他们精神世界的崇高和内心的美丽。他不是静止地对他們进行歌颂，而是讓他們在生活中经受考验和斗争，通过斗争，让我们一步步认识这些平凡而伟大的人物。当我们随着张工程师去观看桥墩、去抢救水泥时，当我们看到他对待常飞、小刘和韦珍的态度时。我们认识了

这个老工程师对生活有着何等严肃的态度，虽然他有厉害的脾气，对于热爱生活的人却是可敬可爱的。当我们随着老闆走上急风骤雨的工地，看到他处理工作和对待梁建的态度，这个顽强深沉的人在困难面前，象一座山一样，高大雄伟不可动摇，而对待同志，又充满了多么深厚的感情。当我们看到倔强大胆的韦珍用毫不妥协的态度对待常飞，用献身的精神去抢救小孩时，这姑娘呵，简直净化了，没有丝毫的利己心。当我们看到小刘攀着铁索，忍受着肉体上难以忍受的痛苦，去拯救上万工人的生命时，我们彷彿体验到站在抢渡大渡河那幅油画面前的感情，忠诚勇敢使得这个文静的小伙子变成一座严肃的塑象，吸引了所有人崇敬的目光。无论是老闆、韦珍，还是小刘和老工程师，在杜鹏程同志的笔下，都是普通劳动者，又是高度的精神准则。他们既平凡，又崇高。他们是这个时代所滋养成长的，通过他们，又可以看出这个时代的面貌。杜鹏程同志塑造正面人物，就象是对生活唱出热情的颂歌，他这种强烈的倾向性和善于在斗争中突出人物性格的才能是使他的作品发出不同凡响的重要原因。

对于反面人物，作者也运用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原则。他批评了梁建，也教育了梁建。作者对这个人物是有着深厚的同情的。甚至在严格批评他的时候，也赋予他以明朗的外形，让人们记起他过去的功绩。但这并没有妨碍作家去揭露他的个人主义。作家对梁建的揭发是发人深省的。他不仅通过一系列重大事件，写出个人主义对我们事业的巨大危害性，而且也写出了个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天然联系。当一个人被个人主义腐蚀时，他就会失去对事业的责任感，失去对生活的兴趣。甚至对于过去的光荣，对于用鲜血凝成的友谊，对于真诚的帮助也投下市儈式的阴影。

作者严肃地批评了梁建，描写这个人的心上已经蒙上一层灰尘。但又让我们看到灰尘底下潜藏着一些宝贵的东西在闪光。当他站在嘉陵江上想起自己近来的生活时，他也曾对自己表示了深深的悔恨；当老闆和他讲起那个为保全梁健而遭受敌人的严刑拷打弄得全身瘫痪、双目失明的老大娘时，他也曾流下黄豆大的泪点；当他看到暴风雨将对工地带来可怕的损失时，他也曾激起内心的力量。正是这些因素，使我们感到，如果他心上的灰尘迁到激烈的冲刷，发光的东西就会显露出来。作家没有详细描写梁建的转变，却通过小刘的死，描写了梁建心灵深处的变化：

“梁建那灰暗无光的眼珠，转动了几下。山，树木，人羣，在他眼里时而东倒西歪，时而忽高忽低。他看不清老闆的脸腔，看不清老工程师的白胡子，看不清韦珍的眼睛，也看不清张孔的姿态，而小刘那闭着眼睛的面孔，却看得清清楚楚！他颓然地低下头。他身边有什么人悲痛地说：“小刘在战争中随时可以丢掉命而没有丢掉命，在这可以不丢掉命的地方反而丢掉了命！”这话不假。可是小刘为什么死去？谁杀害了他？是大雨？是狂风？是洪水？是……梁建的眼泪象决了堤的小河，顺着黄瘦的脸往下流，顺着那很久没刮的胡髭往下流。胸前的衣服透湿。他什么也不能想，什么也不愿想，只能让这滚热的眼泪把他整个地冲刷一遍。冲刷一遍！”

由于有了前面那些细致的描写，我们看了这一节文字之后，就相信了一个没有说出来的结论，梁建面临着生活的转折点。眼泪冲刷着心上的灰尘，唤醒理智和力量，这个在生活的激流中曾经游倦了的人，将会从此恢复失去的勇气，坚强地生活下去，对人民作出有益的贡献。这是小说给我们作出的暗示，也是人物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

关于“在和平的日子里”，我们可以学习更多的东西，还是暂且打住，让我们从上面几

篇小說里吸取文学作品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有益經驗吧！

三

从上面几篇作品来看，文学作品反映人民内部矛盾有几个值得注意的問題。首先，需要正确分析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本質矛盾与非本質矛盾的性質。也就是說，需要作家站在先进階段的立場对事件的性質，对本質与現象的联系作正确的判断。生活是紛紜复杂的，矛盾的本質并非常常赤裸裸地袒露出来。而現象总較之本質更为丰富，現象在某些条件下正确地表現了它的本質，在另一些条件下，則歪曲地、虛幻地表現了它的本質。这正如我們在生活中迂得到的坏人不一定都具有青面獠牙的咀臉，而文質彬彬的外貌下也可能掩蓋着一顆虛偽的灵魂一样。因此，一个作家在观察生活时，如果只观察生活的表面，就会混淆矛盾的性質，或者把人民内部矛盾誇大为敌我矛盾，或者把本質矛盾降低为非本質矛盾而导致对生活的歪曲。如鴨（作者：刘勇。“人民文学”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号。）就錯誤地把帶有敌我性質的矛盾描写成人民内部矛盾，小說通过一件小事描写农村的階級斗争。富农“无人惹”的鴨子吃了社里的秧苗，被农民“天不怕”打伤了。引起一場爭吵，这本是階級斗争的反映。但是，作者却讓“无人惹”在斗争中占了上风，讓“天不怕”答应賠鴨子，“天不怕”索还死鴨，“无人惹”也不同意。正当这时，“无人惹”的儿子不經心露出鴨子沒有死的事实，使她受到一点小小的嘲弄。这篇小說給人总的感觉是：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天不怕”竟然怕了富农，“无人惹”还是无人敢惹。这說明作者对矛盾的性質是認識不清的，把帶有敌我性質的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并且讓富农占了上风，是不符合生活的真实而且犯了原則性錯誤的。另外，我們也看到一些別有用心的人，为了歪曲社会主义制度，故意誇大矛盾的性質。如刘宾雁的“本報内部消息”、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人”都是屬於这种类型的作品。他們从敌对階級立場出发，把官僚主义与人民羣众这种在我們社会里的非本質矛盾誇大成为本質矛盾，想藉此把社会主义制度描写成官僚主义的溫床，把我們社会描写成漆黑一团，阴森可怕的样子。由此可見，正确分析矛盾的性質对于作品真实地反映生活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也是我們评价一部作品的出发点。

有了对矛盾性質的正确認識之后，还需要有正确解决矛盾的方法，毛主席教导我們，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可总结为“团结——批評——团结”这样一个公式，“講詳細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經過批評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一指示对于文学作品反映人民内部矛盾有极其重大的指导意义。遵循这个方法，我們就有了对待自己人的正确态度和处理問題的正确原則。如上所述，“在和平的日子里”批評了落后人物，也教育了落后人物，就正确运用了这个方法。而另一篇作品“‘啥都管’和‘自管己’”（作者：李德复。“长江文艺”一九五九年四月号）在解决矛盾时就沒有坚持这一原則。作品描写“啥都管”与“自管己”之間的斗争是共产主义思想与自私自利思想之間的斗争。先进的“啥都管”在多种情况下对“自管己”的自私自利行为进行批評都沒有收到效果。后来，“只管己”到小卖部拿煙不付錢，作者讓“啥都管”打破“只管己”的头，把他送入医院，解决了矛盾。很显然，这种处理矛盾的方法越出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降低了正面思想的力量。它不仅沒有教育反面人物，也破坏了正面人物性格的完整。从

而使作品的思想意义受到了损害。这不能不是因为作者没有坚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的结果。

从以上的分析看来，对矛盾性质进行正确的分析和坚持处理矛盾的正确方法是极其重要的。但对于文学作品来说，仅仅解决这个问题还是不够的。要把生活矛盾反映在文学作品里，还必须服从文学本身的规律。首先，文学不象社会科学一样，以抽象的方法，揭示矛盾的本质，直接把它表述出来，而是通过形象化的独特方式来表现生活的矛盾。同时文学反映生活矛盾的主要目的，是通过矛盾斗争，揭露落后力量的腐朽，描写进步人物的典型形象，从而作用于人们的思想。因此，生活中的矛盾斗争在文学作品中就需要转入性格冲突。只有通过性格冲突，才能激起人们对旧思想的憎恨和学习新人物的愿望，才能鼓舞人们与困难作斗争的决心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念。在这方面，那种只注意事件的描写而不注意性格的塑造的作品是不能完成任务的。如“在新的革命面前”（长江文艺一九五八年十一、十二月号）虽然描写了由合作社转公社的重大事件，描写了本位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矛盾，却因为忽略个性的刻画缺乏感人的力量而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与个性化的要求相适应，文学作品描写矛盾解决的方式也不能只满足于符合“团结——批评——团结”的总原则。还需要根据个性发展的需要找出解决矛盾的具体的独特的方式。有些作品忽略了这一点，用千篇一律的原则代替对性格的具体分析，使性格的发展、转变缺乏合理的根据。或者使人感到人物转变不合性格发展的逻辑，或者使人感到矛盾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解决。这种作品虽然思想正确，却缺乏生活的真实感。如“一个半木匠”在一种没有冲突的情况下使得一个具有很深的个人主义思想人物展开内心斗争而骤然转变，就使人不能信服。相反地，“在和平的日子里”的作者并没有细致地描写梁建转变的过程，却由于详细地描写了梁建在每一件事情上的心理变化，展开了丰富的内心斗争。因而虽然只简单地描写梁建的觉醒，却使人感到矛盾正在获得解决。这说明，在文学作品里，研究人物的个性从而找出适应于个性发展需要的解决矛盾的方式是值得注意的。

其次，除个性化的要求而外，文学作品反映生活矛盾的重要原则是它的典型性。文学作品是为了概括地反映生活的发展才具体地描写生活的矛盾斗争的。在这里，概括化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因此，文学描写生活的矛盾就要求把矛盾集中典型化。人民内部矛盾虽然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斗争仍然是尖锐的。在生活里，矛盾斗争的形式可能是显著的不显著的。而文学作品则要求把矛盾集中起来，加以典型化，通过尖锐的斗争，使人感奋和震惊。因此，就不能把这种斗争表现为一种没有冲突的情况。如“一个半木匠”虽然描写了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对事件的不同态度，但并没有展开真正的思想冲突，就显得作品苍白无力，无论对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的塑造都不是成功的。而“在和平的日子里”通过巨大的事件把矛盾集中起来，在关系着上万人的命运的事件上展开激烈的斗争，通过斗争表露了正面人物精神世界的崇高和反面人物的卑怯醜恶，就使人得到深刻的教育。

矛盾的集中和典型化还表现在反映矛盾的深刻性。所谓深刻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需要突破狭小的生活角度，用高瞻远瞩的目光，揭示生活里重大的矛盾。如“在和平的日子里”描写人们如何对待生活的主题就比在一件工具改革、一项技术革新上所展开的先进与落后的斗争具有更概括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描写矛盾的深刻性还表现在突破矛盾的表象揭示矛盾的本质，这对于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是有影响的。“如一个半木匠”

和“春桃”所描写的题材都不是生活中重大的题材，所展开的斗争都是先进与落后的斗争，但两者的效果却有着明显的不同。这就是因为“一个木匠”只描写进步与落后力量对待事件的态度而没有展开斗争，也没有揭示隐藏在事件后面的更深刻的本质。“春桃”则通过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的斗争而展示了两股社会力量的斗争，揭露了影响这一斗争进行的真正原因。这就使得这两个作品具有不同的影响而后者比前者具有更深刻的思想意义。

文学作品反映人民内部矛盾是反映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产生的矛盾，这样的作品所描写的反面人物往往不是敌对阶级的代表，而是人民内部的成员，对于他们，是否也需要采用讽刺手段呢？从上面所举的作品中，也可以得到正确的答案，还是毛主席所说的，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讽刺并不如某些人所说的，只是揭露黑暗的匕首，它也可以是一种批评形式。问题只在于作家站在什么立场如何来运用它。如赵树理同志在“锻炼锻炼”中以幽默的口吻对“小腿疼”、“吃不饱”进行讽刺，就更好地揭示了落后人物的精神面貌。魏子良同志在“春桃”中有意使用了讽刺，让“臭虫”打“春桃”时打着自己。他说：“至于写到他们夫妻俩几次因打春桃而反伤了自己，弄得啼笑皆非，那是我想表示对这种人的讽刺，的确象臭虫那号屡教不改的人，必要时也得整整他。”（“长江文艺”一九五九年四月号第55页。）这种讽刺非常好，让“臭虫”受到自己的惩罚，反过来，“春桃”的主人还向他道了歉。通过讽刺，揭示了落后人物的醜恶，而写出了新人物的有礼有节，这就显示了讽刺的力量。关于讽刺，还是让我们记住毛主席的话：“我们是否废除讽刺呢？不是的，讽刺是永远需要的。但有几种讽刺：有对付敌人的，有对付同盟者的，有对付自己队伍的，态度各有不同。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毛泽东论文艺”77页）

最后，我们还要讨论一个重要问题。文学作品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反映我们今天的社会生活面貌，塑造先进人物的光辉形象，用共产主义思想来教育人民。我们已经说过，文学作品之所以要描写人民内部矛盾，是由于生活本身的要求，是由于生活里本来存在着矛盾斗争所决定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反对那种忽视生活的矛盾和斗争的形而上学无冲突论，反对那种不敢描写落后、困难的理论和作品。但是，还应该看到，我们今天生活的主流是积极向上的，我们今天的时代是奇迹涌现、英雄辈出的时代。我们虽然有落后现象，但落后现象正在不断地被改造。我们虽然有困难，但困难正在不断地被克服。这是生活最大的真实。正因为如此，要真实地反映生活，就要反映生活的主流，反映生活里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也就是反映矛盾双方中起主导作用的方面。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矛盾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三一〇页）毛主席所说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就是人民群众中进步、积极、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人物。是与未来有着联系的先进力量。他们是决定今天社会面貌的重要思想。因此，文学作品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就是塑造这些人物的形象。只有用强烈的感情、触目的色彩描写他们内心的美和道德的优越性，描写他们敢于面对困难、克服困难的勇气，把他们精神境界表现得愈高愈美，才能把我们的社会面貌反映出来。在这方面，“锻炼锻炼”的主人公就显得不够，而“在和平的日子里”的作者则以强烈的倾向性、深刻的洞察力，表现了我们生活中最富有代表性的人物形象，从而表现了这个伟大的社会的优越性。正因为如此，我们给予“在和平的日子里”以高度的评价。

杜鵬程同志描写正面主人公的成功，也再一次說明了，正面人物只能在斗争里成长。要想把正面人物写得光辉夺目，就需要描写矛盾斗争，就需要把他们放在矛盾斗争的中心，让他们去克服困难，战胜落后势力。只有通过困难与落后的斗争，才能經烈火而見真金，才能把正面人物的精神面貌和道德力量充分显现出来，提供人們以效法的榜样。反之，如果按照无冲突論的观点去塑造人物則是永远不能达到这个目的的。

四

文学作品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实际上是如何在生活的发展中描写生活的問題。它涉及的范围是很广的。就以我們提及的問題來說，無論是正确認識矛盾的性質，坚持正确的解决矛盾的方法，無論是用具体的形象描写矛盾和把矛盾集中典型化的能力，或者是运用諷刺，或者是塑造正面人物形象，都牽涉到作家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才能。而归根結蒂，是与作家熟习生活、了解生活、热爱生活的程度有關的。杜鵬程同志之所以能把“在和平的日里”写得这样激动人心，正是因为他熟习生活，对生活有着强烈的感情。多少年来，杜鵬程同志追随自己的人物从战場到建設工地。在枪林彈雨的战斗中，在沸騰的建設工地上，他和自己的主人公在一起，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熟知他們的一切，以致能准确地发现他們心灵里最美的部分，喚起用全力表現他們的愿望，甚至当他們落后于生活时，也不是简单地投下憎恨，而是用深厚的感情去呼喚他們的觉醒。正因为这一切，使得他的作品象洗炼的詩，象热情的乐章，使人們为他的作品深深吸引而激起巨大的力量。如果說，文学作品反映人民内部矛盾有什么窍门，我想，杜鵬程同志这个經驗，就是最重要的，有决定性意义的东西。

目前，有些作家还不敢描写人民内部矛盾，这里面有很多复杂的原因。但如果作家們热爱今天沸騰的生活，認識到文学反映人民内部矛盾是关系到能否真实地反映生活的問題。还有什么理由可以望尘却步呢？感谢杜鵬程同志在文学作品反映人民内部矛盾方面作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我們期望着，繼之而来，将有更多更好的作品出現。